

文章编号:1671-4229(2024)01-0072-12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现状、挑战与路径探析

靳新磊¹, 曹景睿^{2a*}, 曹伟^{2b}

(1.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建筑与设计学院/城乡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广东 肇庆 526072;

2. 珠海科技学院 a. 美术与设计学院, b. 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广东 珠海 519040)

摘要: 在当今国际经济发展中湾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湾区经济更是引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 乃至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支撑。发展湾区经济是一种推动城市乃至国家经济增长的强有力手段, 而粤港澳大湾区有着先天的基础和优势, 但也存在着新的挑战 and 壁垒。基于大湾区的经济基础和现状, 通过与世界三大著名湾区的对比, 瑕瑜互见, 分析自身优势和现存挑战, 分别从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教育人才创新、推动湾区内部产学研一体化、充分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作用、湾区身份认同以及新时代背景下探索新的治理模式等方面, 对大湾区未来的发展路径进行了剖析, 以期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世界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群; 湾区经济; 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志码:** A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Analysis of status quo, challenges and paths

JIN Xin-lei¹, CAO Jing-ru^{2a*}, CAO Wei^{2b}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Research Center of Urban and Rural Cultural Development,

Guangzhou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aoqing 526072, China; 2a.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2b.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 Rural Planning, Zhuha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uhai 519040, China)

Abstract: In today'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Bay Area occupies a pivotal position, and the Bay Area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that lead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and even affects the entire world economy. Developing the economy of the Bay Area is a powerful means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ities and even the country.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innate foundations and advantages, but there are also new challenges and barriers. Based on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status quo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by comparing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with the other three major bay areas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advantages and existing challenges, respectively in terms of system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promoting education talent innovation; how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cademia and research within the Bay Area; how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Hong Kong's "super contact"; the identity of the Bay Area and how to explore new governance model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etc.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provides certain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building a world-class bay area and a world-class city cluster.

Key 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urban agglomeration; bay area economy; development strategy

收稿日期: 2022-03-31; 修回日期: 2022-10-13

基金项目: 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资助项目(2023KQNCX119); 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资助项目(2022KTSCX175)

作者简介: 靳新磊(1997—), 男, 硕士. E-mail: 17900496@qq.com

*通信作者. E-mail: 958710018@qq.com

引文格式: 靳新磊, 曹景睿, 曹伟.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现状、挑战与路径探析[J]. 广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 23(1): 72-83.

据统计,排名世界前50的大城市中,有90%都是港口城市,排名世界前75%的大城市都分布在距海岸线100 km以内,从这些客观数据中可以看出湾区对于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建设成世界一流湾区可以消除制度壁垒,解决区域协同发展瓶颈;对国家而言,建设成世界一流湾区,不仅可以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同时还可以辐射到周边国家,促进“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成功实践“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对世界而言,其开放的经济政策给世界提供了一种新动能,带来了新机遇。但有机遇就会有挑战,对于一个湾区“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个法律体系”所带来的现实问题,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如何消除壁垒、摆脱体制束缚,三地政府如何统筹兼顾跨境协同发展^[1],对大湾区来说面临很大的挑战^[2]。

1 活力之源:湾区导向

1.1 基本概念

1.1.1 世界一流湾区

湾区是一个或相连的若干个海湾或港湾加上相应的海岛所组成的经济活跃的城市密集区。湾区经济最早起源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现如今全世界湾区数量不胜枚举,仅中国面积在5 000 m²以上的湾区就有200个,而世界上形成湾区经济体的大约有60个,较为成熟的世界一流湾区只有3个,即美国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日本的东京湾区。同样是湾区,为何只有少数能够形成湾区经济?究其原因它们是它们因湾而立、环城而聚、通陆而荣。拥海抱湾的地理结构,构成了湾区先天的地理优势,大城市聚集引领的空间格局,合群通陆的开放政策,产生了“港口群+产业群+城市群”的叠加效应,形成了湾区经济^[3],从而发展成为世界一流湾区。

1.1.2 世界级城市群

城市群是城市经济发展从相互竞争走向合作共赢的必然产物,最终的结果是经济发展高度一体化。关于城市群的定义是个复杂的问题,已有城市群研究文献对其定义不尽相同,但分析对比可以得出符合城市群的特征: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一个或以上特大城市为核心,3个或以上大城市为基础构成,依托发达的社会基础设施和通信网

络,形成的经济网络高度一体化、空间组织高度协同化的城市群。根据戈特曼的大城市群特征理论,可以得到以下规律:①城市群是由单一城市经济吸附并扩散发展而来,规模不断扩大;②城市持续扩散发展的内因是土地资源的稀缺,土地的稀缺导致使用成本上升,土地成本的上升就会筛选对土地不同依赖程度的产业,以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了城市扩散成城市群的动态演变过程;③城市群的持续发展离不开高度发达的交通网络体系、基础设施和均等化的公共服务^[4]。城市群发展到一定程度成为国内经济发展支柱乃至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时,便发展为世界级城市群,目前公认的世界级城市群有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伦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以及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5]。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城市群)位于中国南部,是中国城市群中城市化率最高的经济区。

1.2 粤港澳大湾区概况

自唐朝以来,广州就是重要的港口城市。清康熙年间,设立广州十三行,广州港作为唯一的通商口岸,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窗口,走向世界的桥梁。2017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并制定大湾区发展规划,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这标志着大湾区的区域合作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直到2019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6]的正式发布,内容具有明确的指导和要求,为大湾区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2020年10月29日,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又进一步提出要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2021年9月,陆续印发了有关深圳《前海方案》、香港《北部都会区规划》和珠海《横琴方案》,都在政策上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和规划^[7]。其中,深圳前海合作区变化较大的是空间总面积由14.92 km²扩展至120.56 km²,香港也随后制定了北部都会区的规划纲要作为回应,决定以1/3的香港土地面积与深圳紧密合作,来应对经济变革,两个重大战略部署对两地的意义深远;而在《横琴方案》中带来的更是历史性的改变,它将会肩负起加快澳门与内陆的产业合作交流,促进澳门的经济产业多元化的重任,是

我国“一国两制”的实践新基地。不同于以往的特区政策,此次重大战略在空间效应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不仅是对内陆城市整体实力的带动作用,也融入了港澳两地区域性融合发展的新动能,从而携手大陆走向世界。以上几个重大战略部署突破了跨界合作发展瓶颈,在解决区域一体化问题上找到了突破口。

粤港澳大湾区,顾名思义,由粤、港、澳 3 个地区组成,包括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珠三角地区的 9 个地级市,分别为香港、澳门、深圳、广州、佛山、珠海、东莞、惠州、江门、肇庆和中山,总共 11 座城市。粤港澳大湾区总占地面积约 5.6 万 km²,截止到 2020 年末总人口已达 8 634 万人。

粤港澳大湾区所处区域被珠江水系冲刷、沉积分割成东西两岸,东岸地区多为山地、台地,而西岸地区多以丘陵和江河水网组成。改革开放以前,西岸发达的水网更适合农作和运输,形成早期的农业文明,东海岸发展相对滞后。改革开放后,东岸的地理和地形优势得到充分体现,尤其是深圳市 2018 年 GDP 总量赶超香港后,在大湾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相对于西海岸经济发展迅速。位居第三位的广州市 GDP 总量也超两万亿,成为大湾区的经济重心。处于第一梯队的 3 座城市虽都是核心城市,但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香港是国际性都市,具有全球影响力,作为大湾区的“超级联系人”存在,深圳和广州在公司组织和企业分布方

面有很明显的差异。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华南经济中心和省会城市的广州,服务类企业分布密集,行政资源优势吸引了大量央企、国企以及跨地公司的入住。作为中国的经济特区、金融中心的深圳,第二产业的电子通讯发展迅猛,吸引了大量的民营企业,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除此之外,第四位的佛山在 2019 年 GDP 已超一万亿(表 1),第五位的东莞紧跟其后。从 2019—2020 年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处于西海岸的珠海虽 GDP 总量不高,但人均 GDP 稳居高位,超过广州,次于深圳,反映出珠海居民较高的幸福生活指数。值得关注的是中山市在 GDP 增长方面较为缓慢,与同在西海岸的珠海市形成对比,发展质量有待提升。区位的不同导致大湾区各城市的发展速度不一,形成不同的区位优势特征,最终导致不同的区域地位。经济区位格局也由以前的港澳两极演变成广深港澳多极中心,集中在大湾区中南部,呈现出倒“U”型的发展格局^[8]。但受疫情冲击的影响,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港澳经济受到较大影响,由表 1 和表 2 中的对比数据可以看出,经济受损较为严重的、首当其冲的就是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的澳门,其 GDP 总量从 3 715 亿元直降到 1 944 亿元,疫情期间旅游业几乎停滞,以博彩业为主的产业损失严重,GDP 指数呈现大比例负增长(表 2)。但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来看,大湾区整体的人口和经济总量一直在快速增长。

表 1 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2+9”城市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of “2+9” cities in Dawan District in 2019

城市	GDP		年末人口 /万人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万标准集装箱	人均 GDP	
	绝对值/亿元	比上年增长/%			绝对值/(元/人)	比上年增长/%
广州	23 628.60	6.8	1 530.59	2 323.62	156 427	3.9
深圳	26 927.09	6.7	1 343.88	2 576.91	203489	3.0
珠海	3 435.89	6.8	202.37	255.58	175 533	-0.2
佛山	10 751.02	6.9	815.86	443.88	133 850	3.6
惠州	4 177.41	4.2	488.00	41.27	86 043	3.1
东莞	9 482.50	7.4	846.45	404.77	112 507	6.6
中山	3 101.10	1.2	338.00	144.30	92 709	-0.6
江门	3 146.64	4.3	463.03	158.27	68 194	3.5
肇庆	2 248.80	6.3	418.71	66.87	53 936	5.3
香港	25 254.79	-1.19	752.08	1 830.30	382 046	-1.9
澳门	3 715.00	-4.71	38.8	13.30	645 438	-6.6

注:数据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 2020》。

表 2 2020 年大湾区“2+9”城市主要指标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main indicators of “2+9” citie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in 2020

城市	土地面积 /km ²	GDP		年末人口 /万人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万标准集装箱	人均 GDP	
		绝对值/亿元	比上年增长/%			绝对值/(元/人)	比上年增长/%
广州	7 249.27	25 019.11	2.7	1 874.03	2 350.53	135 047	0.6
深圳	1 997.47	27 670.24	3.1	1 763.38	2 654.79	159 309	0.2
珠海	1 736.46	3 481.94	3.0	244.96	183.87	145 645	-2.2
佛山	3 797.72	10 816.47	1.6	951.88	404.97	114 157	0.2
惠州	11 347.39	4 221.79	1.5	605.72	46.39	70 191	-0.3
东莞	2 460.08	9 650.19	1.1	1 048.36	379.63	92 176	0.9
中山	1 783.67	3 151.59	1.5	443.11	141.84	71 478	-0.1
江门	9 506.92	3 200.95	2.2	480.41	166.89	66 984	1.1
肇庆	14 891.23	2 311.65	3.0	411.69	57.60	56 318	2.3
香港	1 110.20	27 107.00	-5.4	742.83	1 797.00	362 310	-5.1
澳门	32.90	1 944.00	-56.3	68.31	12.14	285 314	-56.8

注:数据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 2021》。

由于疫情原因,2019—2020 年间人口增长和经济总量均受到较大影响。人口增长方面,增长率较高,除香港和肇庆两个城市出现负增长外,其他城市均出现了较大的人口涌入;经济增长方面,由于疫情短时间内的爆发影响了大湾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的流动,经济总量有所增长,但较往年的增长率偏低(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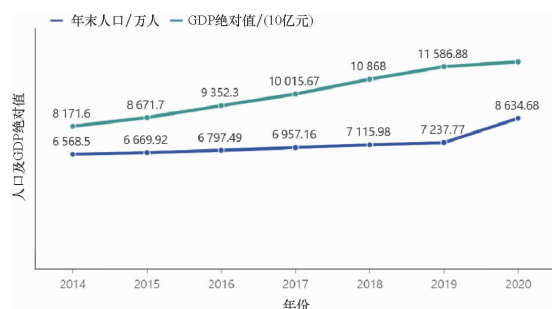


图 1 2014—2020 年大湾区城市指标增长情况

Fig. 1 Growth of urban indicator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from 2014 to 2020

注:数据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 2015—2021》。

2 他山之石:国外三大湾区的经验与启示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外向型湾区,粤港澳大湾区 2018 年 GDP 为 1.64 万亿美元,接近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湾区人口和面积都是最多的,但每平方公里 GDP 产出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比于其他三大湾区中均为最低,仅为纽约湾区的 37% 和 28%,旧金山湾区的 64% 和 22%,东京湾区的 57% 和 56%,可见粤港澳大湾区大而不好。选取国外其他 3 个著名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在科技创新、人文服务、生态治理等方面进行横向对比,吸取总结其他湾区的经验^[9],充分发挥本身优势,从而由大变优变强(表 3)。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具备国际视角。在科技、人文方面,需加强与其他湾区的企业合作、文化交流;在生态方面,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打造宜居宜业的美丽湾区。

表 3 2018 年粤港澳大湾区与国外三大湾区主要指标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main indicators of the four major bay areas in the world in 2018

主要指标	粤港澳大湾区	纽约湾区	旧金山湾区	东京湾区
面积/(万 km ²)	5.59	2.15	1.8	3.69
人口/万人	7 116	2 300	777	4 532
GDP/(万亿美元)	1.64	1.8	0.83	1.92
人均 GDP/(美元/人)	23 584	84 646	106 821	42 256
每平方公里 GDP 产出/万美元	2 937	8 000	4 611	5 190

注:数据来源于《2020 粤港澳数字大湾区融合创新发展报告》。

2.1 对标纽约湾区

纽约湾区地处美国东海岸,拥有人口 2 300 万,下辖 31 个县,是涵盖了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在内的国际化大都市区。2018 年 GDP 总量达 1.8 万亿美元。历经 200 多年风雨的洗礼,现已发展为全球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有着“金融湾区”称号的纽约湾区除了发达的金融业和制造业之外,对湾区生态、科研创新和文化服务等方面也有着较为显著的优势。在生态方面,纽约大都市第四次区域规划把环境建设视为建设重点,大力开展国家公园建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强海岸带韧性以应对气候变化、加强海绵城市建设、改善河流水环境等,并计划在 2040 年之前消除 702 个雨污流溢流口,这与我国生态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妙^[10],值得大湾区借鉴与学习。从某些指标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密集,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为 15.97 m²,而纽约湾区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为 19.2 m²,二者有较大差距;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内部水环境较差,水治理机制有待提升,具体表现为城市污水汇聚入海,污染了珠江口海域,导致珠江口水质为劣四类,对标纽约湾区,空气指标 PM_{2.5} 年均浓度较高,仍需改进。在科研创新方面,纽约湾区 2008—2017 年 SCI 论文发表数量为 806 028 篇(包括高水平论文 25 621 篇),而粤港澳大湾区的相关发表数量为 211 405 篇(包括高水平论文 3 401 篇),二者存在较大差距(图 2)。在文化产业与交流方面,纽约城拥有世界知名戏剧、音乐剧剧场和百老汇等文创集聚区,纽约的电影产业收入占比较高,美国有近乎 1/3 的影片出自纽约湾区。除此之外,众多国际知名刊物总部均设于此,世界前卫的思想、新潮的艺术都诞生于此,成为世界文化的“风向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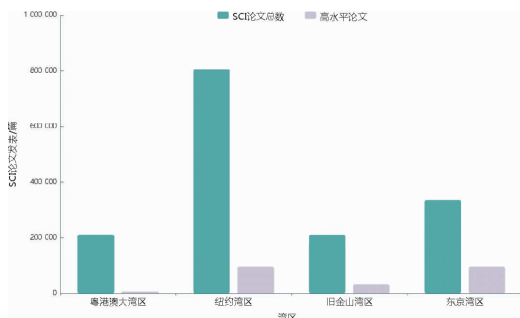


图 2 大湾区 SCI 论文发表情况对比

Fig. 2 Comparison of SCI paper publication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注:数据来源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报告(2019)专利论文对比。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与国外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文化开放程度也越来越高。2018 年粤港澳大湾区举办国际性会议高达 205 场,稳居 4 个大湾区的首位,这足以证明湾区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国际化。但较多大型国际会议均集中在港澳地区,可见港澳仍是大湾区对外交流的窗口。

2.2 对标旧金山湾区

旧金山湾区地处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占地 18 040 km²,拥有人口 777 万人,2018 年 GDP 总量超过 0.83 万亿美元,是世界著名的高科技研发基地硅谷所在地,高新技术企业世界 50 强企业中占到了 4 位,汇集了苹果、谷歌、英特尔、Tesla 等世界级科技企业以及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名校,值得一提的是旧金山湾区聚集了 93 家独角兽企业,比其他湾区的总和多近一倍,是当之无愧的“科技湾区”。当然粤港澳大湾区也不乏高新技术企业,近几年华为手机引领 5G 时代、腾讯企业的崛起,包括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在民用无人机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带动着湾区产业经济快速发展^[11],但世界前 50 强企业只有一席之地,创新企业经济总体量与旧金山湾区仍存在较大差距^[12](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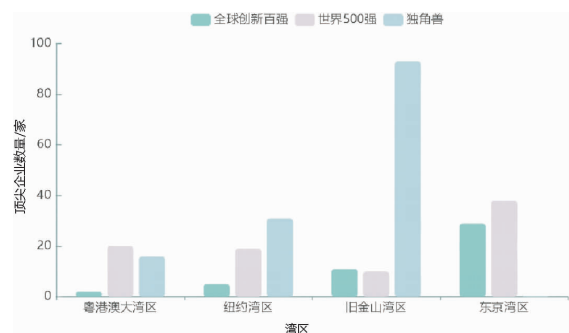


图 3 大湾区顶尖企业数量对比

Fig. 3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top enterprise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注:数据来源于网站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2200725693755536&wfr=spider&for=pc>。

从世界一流高校层面,2018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位于世界前 100 名的高校中旧金山湾区占 3 位,另外拥有 5 个联邦实验室和 70 个研究中心。粤港澳大湾区高校数量多达 173 所,世界前 100 所高校中占到 4 位,同时拥有 43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表 4)。从高校和科研平台数量的对比来看,二者不相上下,但从科研质量的对比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高校与企业合作方面,旧金山湾区已经实现了高效的知识 -

产业转换,旧金山湾区拥有世界排名第二的斯坦福大学,为硅谷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资源,硅谷成为名副其实的“校办工厂”。世界前100所高校中粤港澳大湾区虽占4位,但均位于香港(表5),且教育平台与企业创新平台并未实现互联互通,未将知识最大化外溢,以实现教育科研的社会应用价值。

表4 主要研究机构排名对比

Table 4 Comparison of the ranking of major research institutions

旧金山湾区 研究机构	排名	粤港澳大湾区 研究机构	排名
联邦实验室	2	国家重点实验室	43
州级实验室	20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16

注:数据来源于《2020 粤港澳观察蓝皮书》。

表5 主要大学排名对比

Table 5 Ranking comparison of major universities

旧金山湾区大学	排名	粤港澳大湾区大学	排名
斯坦福大学	2	香港大学	25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27	香港科技大学	37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100	香港中文大学	49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	香港城市大学	55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301	香港理工大学	106

注:数据来源于QS世界排名(2018)。

2.3 对标东京湾区

东京湾区以日本首都东京为中心,地处日本关东平原南部,濒临太平洋,海岸线全长154 km,占地36 900 km²的土地上居住着多达4 532万的人口,人口密度极高,2018年GDP总量1.8万亿美元,占据了日本总GDP的40%,所处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在全球城市群中位居首位。东京湾区工业化程度极高,钢铁制造、现代物流、游戏动漫以及高新科技等产业发展相当成熟,形成了以京滨和京叶为代表的两大工业地带,其中,被全世界所熟知的三菱、丰田、索尼等全球顶尖企业均位于此,有着“产业湾区”的称号。而在制造业发展迅猛的粤港澳大湾区,工业占比达到29%,被誉为“世界制造业基地”,但产业结构仍停留在以制造业为主要增长动力的发展阶段,服务业所占比重在4个大湾区中最低^[13]。

就是在这个工业高度发达的东京湾区,在2016年拟定了东京公园管理规划,开启了走进“后花园”时代,让绿色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东京对于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十分重视,

“工匠”“神社”等城市文化以及大量的历史博物馆和民俗资料馆,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日本历史遗产的文化价值。对于新兴的动漫、科技、艺术文化东京湾区更是大力推崇宣传,成为历史传统与科技创新并存的日本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与文化传承共进,经济发展与绿色环保并存,这种高质量的发展模式值得学习与借鉴。

可见三大湾区各有优势,湾区经济产业特征基本可归纳为双驱动模式^[14]:纽约湾区主打金融+服务业;旧金山湾区主打金融+高科技;东京湾区主打金融+先进制造业。粤港澳大湾区要不断吸取其他湾区的经验,但也不能照搬别人的模式。“一个湾区,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特殊性说明这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区域发展模式,与众不同的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空间格局是包括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在内的四大核心城市多维度的经济辐射模式^[15],区别于其他三大湾区的单一核心城市发展模式,探寻新的湾区经济模式是大湾区的必由之路^[16]。

3 瑕瑜互见:湾区发展存在的优势和挑战

3.1 优势

3.1.1 国家顶层设计

自2017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开始,首次将大湾区建设提升到了国家层面。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层面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承载着多重战略意义,这是其他湾区不可比拟的绝对优势,国家的顶层设计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为世界一流湾区强劲的驱动力,是解决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所在。就如40年前的深圳曾与灯火辉煌的香港隔岸相望,1980年8月26日党中央在此设立经济特区,经过40年间突飞猛进的发展,现如今深圳市GDP总量已超越香港,当然这与深圳市人民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更与来自国家层面的领导与指挥密不可分。例如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到了3个重要的合作发展平台,即深圳的前海、广州的南沙以及珠海的横琴,3个平台各有特色,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具有实验示范的带动作用:①深圳前海主打现代服务

区,包括金融业、科技创新的实验基地,通过学习香港城市建设经验并加强与香港基础设施的高效互联互通,强化前海发展引擎的功能,以达到建成国际化城市新中心的目标;②广州南沙的定位是华南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基地,加强与港澳深度合作,实现产业转型示范基地。在此基础上加强文化建设:岭南文化、水乡文化和海洋文化等,增强湾区生态核心竞争力^[17],打造优质生活圈;③珠海横琴在 2019 年 4 月已经被国家批准建设世界级的休闲旅游度假区,除此之外还包括众多高科技技术产业,例如现代中医药在横琴的发展迅速,有望带动澳门中医药乃至国家中医药层面的现代化发展,同时也为澳门 50% 以上以赌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更多的转型机遇,可见其意义深远。以上 3 个平台的规划均是党中央从国家发展战略出发的统一谋略和部署,深度的规划与思考正是党中央应对全球竞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智慧所在^[18],相较于其他湾区,由于社会制度不同,政策下达的执行速度与所产生的效应也有所差别。以纽约湾区为例,近百年前后进行过 4 次较大规模的规划设计,从 1929 年的《纽约及其周边的区域规划》到 2017 年的《共同区域建设》,都从国家层面超前制定了湾区经济、交通体系、环境保护等相关政策,但政策的制定与管理部分的执行存在某些差距,管理部门是湾区内各地直选的官员组成的议会,必然会产生了官员对所在区域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从而无法平衡整个湾区的负面效应和原本所能达到的最大效益。而我国城市群的区域性发展政策主要依靠国家顶层设计统筹规划,以地方政府联合区域性合作为内在动力,

来解决相邻城市的通病,从而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生。加之粤港澳大湾区的特殊性,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19]。

3.1.2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发展格局的稳定及区域发展的空间秩序与该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息息相关。粤港澳大湾区地处我国重要的地理节点,兼顾海陆空三大交通网络要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变得尤为重要。作为外向型经济湾区,港口和机场是对外交往的门户。数据(表 6)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机场客运量领跑全球,2019 年航空旅客吞吐量高达 21 917 万人次,是旧金山湾区的两倍有余,2020 年受疫情影响,航空旅客吞吐量为 9 942.26 万人次;城际铁路长度仅次于东京湾区,长达 2 024 km;在广州、香港、深圳、珠海、东莞均设有海港,且集装箱吞吐量高达亿吨,是其他 3 个湾区总量的 3 倍,其中,全球十大集装箱港口中,仅粤港澳大湾区就占据三席之位,独具优势。大湾区实现高效互联互通的另一根基是其城市间及其内部交通基础设施数量的快速增长,特别是高速铁路-城市快线-地铁-城市轨道所组成的强有力的空间交通网络,例如现已正常通车的港珠澳大桥、虎门二桥以及还在投资建设的深中通道、深茂铁路等跨湾交通将进一步打破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格局,在此之上,客运专线等轨道交通网的建立,可以实现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架构,从而辐射周边城市,甚至影响推动“一带一路”,带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20]。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表层是人流与车流的快速流通,其深层架构是资金流与信息流的交汇,经济、文化乃至体制机制的摩擦与融合^[21]。

表 6 2019 年大湾区交通互联主要指标对比

Table 6 Comparison of major indicators of transportation connectivity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in 2020

主要指标	粤港澳大湾区	纽约湾区	旧金山湾区	东京湾区
航空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21 917	13 988	9 430	12 799
城际铁路/km	2 024	1 915	344	3 536
机场国际航线连通度/个	165	164	68	137
机场国际航线日均离港运力/(个/日)	131 169	92 629	22 286	51 576
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水平	69	73	/	68
面积/(万 km ²)	5.60	2 015	1.79	3.70
人口/万人	8 635	2 369	765	4 383

注:数据来源于《2020 粤港澳观察蓝皮书》;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水平以新华·波罗的海 2018 年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中各港口得分的平均值代表湾区港口群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水平,旧金山湾区港口未纳入。

3.1.3 文化认同及外来人口红利

大多数区域的长久可持续发展,都需要一种文化价值观作为纽带,拉动区域间的快速发展,小到家庭,大到国家。经济发展只是其发展水平的表象特征,而文化内涵才是其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粤港澳大湾区与其他三大湾区不同:自古以来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同源,无论是历史、语言还是人口变迁,都处于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之中,而并非因经济、地缘亦或政治因素而导致的区域合作^[22]。香港、澳门虽先后被外国列强侵占,呈现出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水平,但在内地谋生的香港新一代对南粤文化认同程度很高^[23]，“血浓于水，根叶相连”，其文化内核未变，文化根源根深蒂固。

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粤港澳大湾区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有着很重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第三产业的比重，与其他三大湾区相比，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近些年来大湾区凭借优秀的人才引进政策、打破户籍制度藩篱吸引了大量的优秀外来人口，2020年大湾区年末人口达到了8635万，连续几年领跑全国，同比是其他湾区人口的2~3倍，甚至更多，现如今大湾区充满了活力，全力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3.2 挑战

3.2.1 制度差异性

区别于其他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具备“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特殊制度势能。虽说存在制度优势，但也意味着一定的制度壁垒和制度摩擦成本。在行政制度、法律体系、税收制度和建筑工程建设管理制度等方面对跨境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例如在税收制度方面，香港人在内地工作，需要面临内地的高税收，满足15年的社保制度才能领取养老金；香港的企业在内地设厂，需要面临在两地同时征收税费的困扰等等。如此体制机制的障碍将影响大湾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的流动，同时也阻碍着大湾区更深入的合作发展^[24]。

港澳制度与内地制度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制度的差异，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参与度的区别更加明显。例如在建筑工程建设管理制度上，内地的建设管理制度逻辑

来自国家层面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的管控，政府承担主要的监管责任，对建筑设计进行合理化、规范化管理。而香港的底层逻辑则是由市场为主导，政府只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专业人士承担主要权责（建筑师负责制），强调自由、公平和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在权责、规范、管理模式以及思维模式等方面都不尽相同的两地，在跨境合作中会出现一些制度摩擦。内地设计师会把规范条文作为首要标准，更为保守地对建筑方案进行约束；香港设计师则把客户需求和设计质量放在首位。因此，两地不同的设计观念和思维方式导致双方很难相互退让，达成合作。因此，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成为制约大湾区下一步合作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3.2.2 教育资源分配与转换

大湾区的建设需要人才资源支撑，而人才需求仅靠引进政策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入挖掘大湾区产学研一体化机制创新，所以学校教育平台与企业创新平台的互联互通就变得尤为重要。例如旧金山湾区的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合作早已达到了高度融合的状态。而大湾区与之抗衡的一流高校均位于香港，内地与香港的教育平台资源差异较大，且因制度差异两地高校资源互通受限，以及内地高校教育平台与企业创新平台“各不相谋”，双重矛盾导致了大湾区内高校教育缺乏实践创新平台，企业创新原动力不足，大湾区的产学研一体化机制存在严重缺陷，不利于湾区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建设^[25]。所以，香港的教育资源如何在下一步规划发展中扩展到大陆的教育平台中去，以及校企合作中如何将知识与社会效益实现最大化转换，将会是湾区教育革新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4 突围之道：大湾区未来发展策略思考

4.1 体制机制改革

在经济总量上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对标世界一流湾区，但要在经济效率和产业结构上有所突破，就必须在体制机制上有所创新。跨境跨体制跨关税区的通力合作一定是粤港澳大湾区对比其他湾区和国内城市群最本质的差异。所以推动体制机制改革是大湾区下一步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问题。在过去的改革发展过程中，广东省内以城市为单位的协作已经达到多样化、深层次的程度，建

立了较为完善的协调机制。在港澳协作治理上,联席会议制度已成为粤港两地政府通力合作的制度创新,也是广东和香港协同发展跨越社会需求到政府合作的制度保障。但因三地制度运行模式的差异性,在跨境合作机制上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例如跨境合作项目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中,项目的预算会受到香港法律的限制,与内陆的协同机制全然不同,这也导致香港在合作中缺乏协调能力。但制度差异也并非只有制度摩擦和制度壁垒,港澳作为国际贸易大都市,经济贸易高度开放,长期处于国际贸易环境中,有着先进的国际服务标准和体系。广东除了在内陆扩大内需之外,还要向国际市场迈进,把“一国两制”带来的制度红利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制度差异给大湾区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但制度的多元化又能塑造出不同行为主体认知与行为的多元化,在多元制度摩擦融合中产生张力,从而促使新的制度创新^[26]。因此,把握体制机制改革是促进区域发展的核心要义。①必须坚持粤港澳大湾区顶层设计的统筹指导,建立包括中央和三地政府在内的四方联合工作机制;②建立地方性专项小组,完善公共参与机制,集思广益,多吸取内地与港澳各地专业人士的问题和建议;③突破行政区域界限带来的约束,以市场资源配置优化为前提,找到区域协调合作机制。以建筑工程行业为例,因内地与港澳两地在规范、管理模式以及设计思维模式都不尽相同,在项目合作中会出现很多制度摩擦。建议在合作过程中以项目所在地的规范制度条文为准则,合作双方尽全力去满足客户所需,本着优势互补的原则建立起平等互惠的合作关系,针对违反合作的行为制定一定的惩罚机制作为约束^[27]。

4.2 推动湾区人才体制机制创新

在2018年10月30日,香港科技大学第四任校长史维向媒体宣布,要与广州大学携手共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分校,2019年9月26日,香港科大广州校区项目正式动工。这个跨区域办学项目对湾区教育平台具有创新引领的作用。

在这个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时代背景下,在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极具特殊性的区域,同样教育上也存在一定的制度壁垒,珠三角地区有众多大型科技创新企业、良好的制造业生态环境,以及大量的资金和就业机会。港澳地区

拥有全球顶尖的高校,世界前100所大学中有5所位于香港,香港高校有较多的自主权,这是世界上任何城市都无法超越的。香港水平较高的大学,在内陆市场竞争层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凭借着一系列的办学优势和名誉声望,会倾向于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区位来扩大自身优势,从而实现资源扩张。从内陆政府层面,人才资源的不断涌入、人才质量的不断提升,以及当地高校的科研能力,对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创新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因此,城市和高校在互相利益的驱动下便形成了稳定的资源关系链接。高校一旦获得地方政府给予的政策支持和资源优势,就可以打通这个稳定的关系链,从而通过关系杠杆撬动更大的资源空间。粤港澳具有明显的互补优势,香港缺乏的内地都有,内地缺乏的香港都有。双方可以充分结合,做好产学研一体化^[28]。在大湾区也有产学研资源利用比较成功的案例,例如深圳的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无人机研发技术驰名中外,其核心技术主要来源于香港科技大学的科研平台,充分利用了香港高校的教育资源与人才创新平台,在民用无人机领域做到了行业顶端,其市场份额占到了70%^[29]。

香港科大广州分校这一项目就是在大湾区的教育平台层面做了一个很好的探索和创新,既突破了一些教育体制和机制上的障碍,又减少了某些制度摩擦,充分发挥了粤港澳大湾区的特色优势,寻求到一种新的教育模式,从而实现教育上的创新,为其他港澳高校起到示范作用。

所以吸收其他三大湾区的经验,产学研一体化需要政府、企业和高校共同努力,如旧金山湾区多是以企业和高校为主导,美国硅谷的企业通过提供奖学金、实习机会、设计联赛等各种途径与就近的斯坦福大学取得合作,这样就有源源不断的人才涌入市场,企业所产生的效益也能源源不断地反哺高校。而东京湾区则是政府导向更为明显,政府甚至为此出台某些法律制度为高校指明发展方向,还有来自国家层面的高额经费奖励。就我国而言,这一点内陆更应向香港学习,政府主要负责宏观调控、政策引导以及财政补贴等;企业则提供大量的风险资金,敢于投资,针对高校人才实行有效的科研激励和成果转化;高校也要抓住机会,深化与两者的交流合作,但三者不是恒定不变的,不同发展时期发挥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同的,

不过近些年大湾区也慢慢脱离政府的干预,逐渐偏向于市场发展为主、政府干预为辅的发展格局^[30]。

4.3 身份认同

实现“湾民”的身份认同,其内核是实现文化认同^[31]。文化是一个城市、一片区域乃至一个国家的灵魂所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根源血成一脉,有众多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例如岭南文化、侨乡文化等,大湾区原本就有着较为久远的文化渊源,但现如今湾区意识还未达到理想的状态。例如美国西海岸的居民都会称自己为“湾区人”。而在粤港澳大湾区却被习惯性分成香港人、澳门人亦或者广州人、深圳人……湾区想要持续高质量发展,想要提高吸引力和竞争力就必须把湾区人拧成一股绳,树立大湾区意识。在“湾民”身份认同上可以进行一些尝试,例如推广统一的“湾民”身份ID管理认证,并发放专属的社会福利;以岭南文化作为枢纽,开展一系列的文化展览、文化宣传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活动,以实现跨制度资源整合,实现跨区域文化共享,增强湾区认同感。当然要做到身份认同还需要湾区居民长时间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

4.4 重启香港“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提起香港,国际大都市、三大国际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是其亮眼的名片。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的第一目的地和外商投资到内地来的最大来源地都是香港,比例约占60%以上,而在香港的海外投资有很大一部分转投到了国外,反之,外商投资内地的资金也绝非都来源于香港,欧美日韩乃至台湾在内的外商投资也不胜枚举。因此,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一直扮演着“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的国际航运地位,尤其是集装箱吞吐量首屈一指。过去“前店后厂”的模式,原因是广东的制造业非常发达,内地的货源充足,外贸占了全国的23.5%,如此巨量的货源如果都通过运输到香港进行交易出售的话,势必造成码头过于拥挤,效率大大降低。不过,近些年广州、深圳的崛起以及广东港口的发展,带动了经济运作,效率提升显著。据有关数据显示:在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名中,中国港口占有7个,仅大湾区就有3个,分别是香港、深圳和广州。而香港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保持自己国际航运

地位的前提下,做到从吨位大港到价值大港的转型,即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和先进的国际航运服务。

但随着内地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加,香港昔日的优势已不复存在。香港逐渐发展成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制造业萎靡,产业结构空心化。加之全球疫情对港澳的冲击,社会经济指标急剧下滑,首当其冲的就是以博彩业为主、产业结构过于单一的澳门,旅游人数暴跌,同比2019年下降99.6%,相关产业也急速锐减。对于更加多元化的香港,加上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以及中美关系矛盾升级,这些外部因素的变化,都将对香港未来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威胁^[32],所以想要重启香港“超级联系人”这一角色,在国际上占据更大的市场必须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位:一是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东西方、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经贸合作的国际性平台;二是成为大陆与国际市场之间的经贸联系枢纽。前后两者是承接递进关系,香港只有在国际上取得立“城”之本,才会承担起内地对外“超级联系人”的角色^[33],这对大湾区发展成世界一流湾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4.5 新时代背景下的湾区治理模式创新

在湾区治理体系中,交通基础设施是湾区治理的物质基础,也是人流、物流、资金流的重要载体。在新时代背景下,物理环境和实体空间的封锁给湾区治理模式带来了新的难题,大湾区的突发性事件应对及治理需要出台新的策略进行调整和应对。鉴于新冠病毒的高传染性和大湾区人口的高密度,疫情能够快速有效地得到控制,大湾区作为防疫第一线,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也正因为前期缺少应对经验和策略,暴露出很多短板和问题,比如难以解决资源损耗等问题。疫情时期,从国内外防控应对策略对比可以看出,要构建一个健康安全有序的大湾区,湾区治理模式创新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便利和快速应对突发事件便成了治理模式创新的突破点^[34]。未来湾区治理的3个发展方向:①跨界治理。在多制度多规则的背景下,依托各自的资源优势取长补短,例如依托河流进行生态环境共治,建立统一的管理架构和工程技术标准,又如依托医疗保障平台实现健康共享共建,典型的案例是珠海横琴与澳门合作,正着眼于建设世界一流的中医药生产研发基地和创新高地。②智慧治理。依托大数据和智能管理平台,从智能电网、智能交通到数字城市涉及到生活

的方方面面,较为典型的是2020年疫情爆发后大湾区通过政府与企业联合共建信息渠道,利用大数据追踪,为疫情防控、物流配送和资源分配提供了强有力的协助。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也将旗下无人机应用到交通巡查、物资运输等方面,此外,全民应用电子健康码也是高新企业协助政府合作的一次成功示范。大湾区应以此次疫情为契机,建立三地信息共享平台,搭建网络信息平台架构,填补湾区治理机制不足,从而拓展到不同领域中去,来应对未来更为广泛的未知领域的重大突发性事件,通过网络化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建立区域共享和常态化交流平台体系很有可能会是未来湾区治理模式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③基层治理。现如今社区治理在大湾区基层管理仍有待提升,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是此次疫情的第一道防线,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也暴露了很多短板,由于规划建设前期缺乏对韧性的考量,面对突如其来的冲击和灾难,难以在管理和便利之间做到平衡,智能化或许可以提供些许方法和思路。还有目前国内的社区治理仍需要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政府主导决策占比大,公民社区意识不够,此次疫情管控将问题暴露无疑,距离真正的合作、信任、自我管理的社区自治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建设好基层社区

才是社会应对突发状况最重要的建设目标。

5 结 语

现如今湾区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1+2+3”(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组合势能完全释放出来,真正做出“9+2>11”的效果。从地域范围和经济总量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可以比肩世界一流湾区了,湾区也正朝着成熟化、规则化发展。细分到各个量化指标上,粤港澳大湾区与其他三大湾区相比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传统文化建设、产学研一体化机制、第三产业结构比例和湾区共同体意识等方面,仍存在很多不足,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织网。在体制机制改革上,一定要坚持国家顶层设计的统筹指导,以市场资源配置优化为前提,突破行政区域界限带来的约束;在人才体制机制创新上,要充分调动政府、企业和高校的积极性,从其他湾区产学研一体化的运作上吸取经验;在湾区治理层面上,既要把未来的建设重心放在跨界治理、智慧治理和基层治理中去,又要增强“湾民”的自我认同感,提升湾区的文化凝聚力。从历史视角看,有国家的大力扶持,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梦想并不遥远。

参考文献:

- [1] 蔡赤萌.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挑战[J]. 广东社会科学, 2017(4): 5-14, 254.
- [2] 曹伟. 新引擎: 粤港澳大湾区[J]. 中外建筑, 2018(2): 1.
- [3] 申勇. 湾区经济的形成机理与粤港澳大湾区定位探究[J]. 特区实践与理论, 2017(5): 42-46.
- [4] 陆军, 宋吉涛, 谷溪. 世界级城市研究概观[J]. 城市问题, 2010(1): 2-10.
- [5] 方创琳. 中国城市群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与未来发展方向[J]. 地理学报, 2014, 69(8): 1130-1144.
- [6] 新华网.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EB/OL]. (2019-02-18) [2022-02-21].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2/18/c_1124131474_5.htm.
- [7] 钱林霞. 建筑规划、建筑设计助力前海、横琴方案实施[J]. 新经济, 2022(1): 12-16.
- [8] 周春山, 罗利佳, 史晨怡, 等.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热带地理, 2017, 37(6): 802-813.
- [9] 刘毅, 王云, 李宏. 世界级湾区产业发展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启示[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0, 35(3): 312-321.
- [10] Feng R D, Wang F Y, Wang K Y, et al. Quantifying influences of anthropogenic-natural factors on ecological land evolution in mega-urban agglomeration: A case study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1, 283: 125304.
- [11] 沈子奕, 郝睿, 周墨. 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及东京湾区发展特征的比较研究[J]. 国际经济合作, 2019(2): 32-42.
- [12] 张胜磊.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路径和建设战略探讨: 基于世界三大湾区的对比分析[J]. 中国发展, 2018, 18(3): 53-59.
- [13] 许培源, 吴贵华. 粤港澳大湾区知识创新网络的空间演化——兼论深圳科技创新中心地位[J]. 中国软科学, 2019(5): 68-79.

- [14] 陈德宁,郑天祥,邓春英. 粤港澳共建环珠江口“湾区”经济研究[J]. 经济地理,2010,30(10):1589-1594.
- [15] 向晓梅,杨娟.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的机制和模式[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7-20.
- [16] 李邠,周金苗,黄耀福,等. 从巨型城市区域视角审视粤港澳大湾区空间结构[J]. 地理科学进展,2018,37(12):1609-1622.
- [17] 林媚珍,周汝波,钟亮. 基于景观格局变化的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研究[J]. 广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18(2):87-95.
- [18] 雷霞. 我国城市群发展中的政府作用研究[D]. 成都:四川大学,2021.
- [19] 赵晓斌,强卫,黄伟豪,等.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理论框架与发展战略探究[J]. 地理科学进展,2018,37(12):1597-1608.
- [20] 卢佩莹,王波. 从区域一体化看融合交通——以粤港澳大湾区和港深广高铁线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2018,37(12):1623-1632.
- [21] 邱坚坚,刘毅华,陈浩然,等. 流空间视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空间网络格局——基于信息流与交通流的对比分析[J]. 经济地理,2019,39(6):7-15.
- [22] 张晶盈. 东南亚华人文化认同的内涵和特性[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15-24,80.
- [23] 邓志虹.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认同研究[J]. 合作经济与科技,2021(19):24-25.
- [24] 马向明,陈洋. 粤港澳大湾区:新阶段与新挑战[J]. 热带地理,2017,37(6):762-774.
- [25] 张功,郭玲,马晓琳. 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2020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1 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C].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1.
- [26] 钟韵,胡晓华. 粤港澳大湾区的构建与制度创新:理论基础与实施机制[J]. 经济学家,2017(12):50-57.
- [27] 覃成林,刘丽玲,覃文昊.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战略思考[J]. 区域经济评论,2017(5):113-118.
- [28] 黄晨榕. 湾区建设与高等教育集群联动发展:以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为例[J]. 世界教育信息,2021,34(2):45-51.
- [29] 陈文理,何玮. 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和人才合作机制研究[J].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6(6):30-44,119.
- [30] 辜胜阻,曹冬梅,杨媚.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的战略思考[J]. 中国软科学,2018(4):1-9.
- [31] 温朝霞. 论中华文化认同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J]. 探求,2019(1):58-63,77.
- [32] 郑晴. 从国际湾区发展看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的定位[J]. 现代国际关系,2020(7):51-58.
- [33] 杨英. 从“超级联系人”角度论香港经济发展定位[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96-103,191.
- [34] 丁焕峰,谭一帆,孙小哲. 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治理体系的建构讨论[J]. 城市发展研究,2022,29(8):77-83.

【责任编辑:孙向荣】